

有关云冈石窟的一个文物事件



《沉默大佛与无言口碑》
张平 著 作家出版社

内容简介

本书收录了作家张平在不同时期创作的多篇散文作品，记录了作者对文化、历史、人物、生活等方面的感悟和思考，展现了一位作家的人文关怀和对生命的热爱。文化遗产与保护是这部散文集的核心主题之一。作者以云冈石窟、汾酒等文化符号为切入点，探讨了中国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中的传承与发展。

留传至今的大同云冈石窟，大规模的建造是从北魏中期起始，曾聚集数万工匠，凿山为壁，夜以继日，创立了这一举世称奇的人间瑰宝。

北魏极盛时，以平城（今大同）为都，北伐南征，横扫北燕，攻陷北凉，征服胡夏，收获河西，尽取关中，扩地千里，一统北方，结束了十六国百年纷争的血腥局面。在此之后，北魏王朝又在社会、文化、政治、经济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重大改革。召还流民，整顿吏治，注重教育，尊崇德行，兴利除弊，缓解社会矛盾，使得国力逐步增强。

北魏王朝最大的壮举，就是全面强行实施汉化，尊儒教，行周礼，建太庙，正祀典，去长尺，废大斗，改重称，全国上下，一律汉服，举国迁都洛阳后，甚至下令改掉了鲜卑复姓为单音汉姓，大力提倡鲜卑人和汉人通婚，即使死后也不准还葬平城，可以说，完全是北魏王朝自己毫不留情地亲手毁灭了自己的落后文化。

今天看来，也许这就是文化的力量，而当时的汉文化，也确实是属于先进文化的范畴。先进文化的力量，是不可战胜的，即使你可以暂时毁灭了人们的躯体，断绝了它们之间的联系，但它仍然会顽强地存活并成长在一个民族的血脉之中。

延续至今的云冈石窟，一座座沉默的大佛，似乎在静静地守候和展示着历史上曾发生过的这一切。五胡十六国时，战乱频仍，血流成河，人们只能求助于这些无言的大佛，盼望能逃脱灾难，举家平安。等到国家一统时，世界和平了，人们又在这里纷纷祈祷，企望岁月静好，世世太平。

那时候的大同，和今天的大同已经相隔了一千八百多年。

北魏时代的大同，北依山，东临马铺，西为武州，南靠盆地，地势自西北而东南逐渐降低，位置不高不低，面川而又依山傍水。盆地开阔，水网密布，土地肥沃，杂树交荫。处于广川之上，位于不倾之地，完全符合处国立都的优越条件。云冈石窟兴建于大同西郊，那时候的云冈“……挖池蓄水，开

山引流，灌注园池，凿石切壁，因岩结构，真空巨壮。……弱柳荫街，丝杨被浦，长塘曲池，经水若泽”。处处美景，遂使云冈成为北魏时期皇家和黎民重要的礼佛与游乐场所。

但今天的大同，一是因为气候的变化，二是由于处处蓄水截流，三是受困于云冈四周诸多煤矿的开采，早已是水源枯竭，河流干涸。经年尘土飞扬，风沙遍野，特别是煤矿开采和二氧化硫造成的空气污染以及酸雨侵蚀，对云冈石窟的维护造成了极大的威胁。仅仅几十年，当初石窟外壁星罗棋布的万千石佛，今天已经所见无几。

耿彦波当了大同市长，第一件事就是对云冈石窟这座世界文化遗产，进行了大规模的全方位的维护和修复。关闭迁移十数座煤矿，改善生态，改道云冈石窟上方的运煤公路，封闭云冈四周山岭，截断所有私自偷观石窟的人行通道。还有一个重要举措，在石窟前沿的山沟和石窟四周的区域蓄水筑池，要把云冈石窟还原为一个洁净而又湿润的区域小气候。

当时单霁翔局长最为担心的恰恰就在这里。如果把云冈石窟放置在一个潮湿的环境里，必然会对云冈石窟造成更大的侵蚀和破坏。

耿彦波当时带着单霁翔，其实就是一次现场解说，把当年流经云冈这一带的水道和池塘一一指说给局长。

单霁翔很可能就在那个时候，发现了这个干巴瘦的市长耿彦波，在维护云冈石窟工程方面，已经做了大量开工之前的考察和调研工作。

今天看来，这是一个真正的大手笔，连冯骥才也说，耿彦波这个举措，应该是从根本上解决了云冈石窟的维护问题。但这样一系列举措，也极大触动了很多人的利益。于是，就有了各种各样的检举揭发和告状信，就有了单霁翔雷霆震怒，严厉批示，连夜赶来调查，就有了省委书记半夜电话，让耿彦波凌晨四点就等在这里的文物事件。

其实这件事最终也就是一个很快就被证实了的误打误撞和误判。

耿彦波毫无私心，集思广益，认真调研，货真价实地做了一件了不起的事。耿彦波十分幸运，而云冈石窟也同样十分幸运的是，碰到了一个在工作上格外较真，对文物保护举措十分务实从善如流的单霁翔，居然连夜亲自赶到云冈石窟，非要把这件事弄个水落石出，明明白白。而且对就是对，错就是错，有了偏差，立刻予以纠正。如果换作另外一种性情的领导，作一个严厉的批示，也就完事了，至于工程对不对，有没有问题，那就再也不会过问了，这样一来，那耿彦波的这个黑锅可就不知道要背多久了，云冈石窟这个维护工程也不知要拖到哪年哪月了。

那天等大家看到他们两个从山头上走下来时，所有的人都有些发蒙。他们俩一路比比画画，滔滔不绝，情绪热烈，言谈不休，都已经好几个小时了，依旧毫无倦意。那模样，就好像两个好朋友，很多年没见面了一样。直看得我两眼发愣，什么叫惺惺惜惺惺，眼前就是。

我猜想当时他们之间肯定有过一番激烈的争执和交锋，当然也会有各执一词的诉说和辩解。但最终是怎么说服了对方，怎么感染了对 方，那就不不得而知了。

十几年过去了，今天看来，缜密的科学数据，完全证明了当时的举措对云冈石窟的保护功不可没，功德无量。

今天想来，不管是任何一方，当年他们的作为，都值得我们深思和敬仰。能做到这一点，真不容易。

这是我当副省长不久后，第一次碰到的一件十分头疼，也十分棘手的大事。头疼是因为省委书记深夜亲自打了电话，棘手是这两个人物都是有名的不好对付的人，让我这个一介书

生根本不知道该如何应对。

没想到这么一个天大的难题，什么工作也没有做，就圆满彻底地解决了。

吃午饭时，单霁翔说：“我回去就写报告，如何保护文物，大同就是一个标杆，云冈石窟就是一个典型事例。”

耿彦波一副十分谦虚的样子：“局长指出了很多问题，做了很多指示，我们一定认真改正，认真完成。”

单霁翔对云冈石窟的维护确实非常投入，他当时甚至提出要用杭州西湖的办法，用钢化玻璃做成巨型罩子，就像罩住雷峰塔那样，把云冈石窟也整个罩起来。

这更是一个大手笔。

令人惋惜的是，云冈石窟巨型钢化玻璃罩子的设想还没落实，单霁翔就调到了故宫。也许这正是故宫的幸运，也就几年时间，平均每天工作十二个小时以上，单霁翔把故宫里里外外全部翻新，整个修复了一遍。金碧辉煌的故宫，焕发了原有的光彩。

耿彦波呢，在大同五年，他几乎完全复原了一座大同古城。去年我到大同，晚上游览古城，城墙上游人如织，热闹非凡，车水马龙，一片鼎沸。于今耿彦波已经离开大同十多年了，但那个导游一边给我们解说，一边仍无比自豪地说了无数遍“我们的耿市长”。

单霁翔到云冈石窟的那一年秋天，冯骥才和韩美林也来到了云冈石窟。听到单霁翔和耿彦波的事情，两个人异口同声地说，张平你一定要把这件事写出来，国家有这样的干部，才是老百姓的福气。

那天他们到了云冈石窟，在景点办事处，两位大家又写又画，劳累了几乎一上午。冯骥才一脸赤诚，画了好几张大画；韩美林挥笔如飞，写了差不多两百幅大字。两个人这么慷慨大方，就一个意思，你耿彦波当市长不易，为了修复文物古迹，处处求人，处处说好话，用我们这些字画，作为礼物送给他们，肯定让你求人办事能更容易一些。

后来一起观摩石窟，冯骥才对着巨佛说，这些文物保住了，文化也就保住了。只要大佛矗立在这里，我们的文化就消亡不了，也没人能消亡得了。

文物是文化的载体和根脉，保护文物就是保护历史，传承文化。文化并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文明的价值演变，文化的外延与内涵都在不断地扩展和变化。当今所有延续至今的强势文化，无一不是不断吸收世界人类文明的结果，无一不是不断扬弃自身精华和糟粕的结果，无一不是守正创新，不断进步的结果。

北魏如此，大唐如此，宋明如此，当今时代也一样如此。

近两千年过去了，大佛无言，一直静静地伫立在这里。北魏至今，一代一代的皇帝国威和大吏要员，人们早已都忘记了。只有大佛，只有文化，仍然经天纬地。一晃十几年又过去了，当年的英雄们都老去了，但单霁翔、耿彦波、冯骥才、韩美林这些人物依然活灵活现地呈现在自己的脑海里。

有这些人在，文化就在。有更多这样的人在，我们民族的文化就会千秋万世，历久弥新。

作者简介

张平

民盟盟员，当代作家。祖籍山西，生于西安。历任山西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副主席，山西省电影家协会主席，山西省作家协会主席，民盟山西省主委，民盟中央副主席，山西省副省长，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副主席。曾获茅盾文学奖。

国学之道(36)之思想观念

对于一种文化所形成的特点一般会从思维方式上给予最终的揭示。人们常常以天人合一与天人相分来概括中西文化思维方式的不同特点。但我始终认为这种概括是含糊而不准确的。“天”“天地”“阴阳”“万物”“天道”等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都被看成是一种可以感知到的存在，或说是一种现实经验性存在。对于这种存在，中国传统文化始终认为是与人，与人道紧密相联而不脱离的。中国古人将这一思维方式叫作“天人合一”。与此相关，中国古人将“天”“天地”“阴阳”“万物”“天道”等这些自然现象，经验对象与社会人事的吉凶祸福分割开来，认为彼此之间并不存在什么神秘的关联性和感应性，中国古人将这一思维方式叫作“天人相分”。也就是说，天人合一与天人相分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是有其特殊所指的。它们所体现的都是重直观，重经验，重现实，重整体以及反对超验和神秘的思维观。而西方文化，尤其是以柏拉图为代表的唯理论的西方哲学，他们的思维观是与中国传统文化所规定的天人合一与天人相分思维方式完全不属于同一个概念框架内的问题。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天人之学是一种探究经验世界与人的关系问题的学问，而西方传统文化中的唯理论是一种研究超验世界与人的关系问题的学问。中西文化所代表的是一种完全不同的价值取向。

以阴阳观为主要内容的中国天人之学，它所要观察和解决的是“天地人”三才的贯通问题，具体包括“天地人”的构成，天地之性与人 之性的确立，自然与人的协调，天德与人德的和合。而所以这些任务又全是在经验的、物质的世界中完成和实现的。不同方面，不同层次所构成的世界图景都是由人通过“直观”“直取”“类比”诸物之“阴阳”而完成的。由阴阳两种基本元素组成的八卦，六十四卦及其构成的整个宇宙、天地、自然、社会、人生成为包括人在内的所有万物活动的场所。“古之包羲氏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周易—系辞传》》”可见，人们所观对象，所取对象，所通对象，所类对象都紧紧与“物”相联。这就是所有意义上的“天人合一”思想背后更深刻的思维方式——直观万物，即物穷理者也。这是一个普遍联系的整体世界。“一阴一阳之谓道”（《周易》语），“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老子语），“通下一气耳”（庄子语），“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庄子语）决定了天下万物是一体的。这一整体观在中医中更是得到广泛和具体的体现。人体一个有机的整体。构成人体的各器官结构上不可分割，功能上相互协调、相互作用。同时注重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密切联系。可知，直观性思维、经验性思维、类比性思维、整体性思维乃是天人合一思想的基础性思维。

西方两千多年的思想文化虽然形式多样，存在不同的文化形态，但就其文化总特征来说其实都是柏拉图理念论的延续。换句话说，西方哲学的思维观都是由柏拉图理念论奠定的。“一部西方哲学史不过是柏拉图的注脚”（怀特海语），此之谓也。而理念论思维的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它的超验性。理念不是天地自然万物中的存在，而是超越其外的一种与“物”，与“经验”完全脱离的独立存在。因而这种存在是不可用所谓“天”来表示的，从而也不存在什么“天人相分”的说法。为了说明柏拉图理念论或说唯理论 的思维特点，还应对此概念本身作下具体的解释。所谓“理念”是一种理性观念，且是一种数学之公理、形式，简称数理。此理是以“唯”为其特征的。所谓“唯”是用来表示此“理”是不依赖感性经验，或说是完全脱离现实的感性经验世界的超验式的独立存在。此种理性不是我们通常意义上所理解的那个意思，即并不是指经由观察事物要由表及里，由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的那个理性。唯理论的理念、理性乃是一种超验、离物的纯本质性的存在，纯粹逻辑性的存在，纯形式性的存在。西方文化将这种思维称为哲科思维。

要之，中国人都是在“即物”的经验世界中去完成他们的文化活动；而西文人多是在“离物”的超验世界中去完成他们的文化活动。中西文化所反映出来的不同思维观，各自都有其产生的历史和社会基础及背景，亦都有其各自的文化意义和价值。对此我们应该保持一个开放的心态。更为重要的是，我们应该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以及中西文化的互鉴交融中建立起中华文明的新形态。

中国传统文化，或说国学之道也正是在其思想观念的基础上展开了与“文”相关的文明和人文的活动，从而产生出极具中国特色的人文精神呢！



徐小跃(江苏省文史馆馆员，南京图书馆名誉馆长，南京大学哲学学院教授)

国学玄览堂(175)